

隆武帝及其再评价问题

A Reappraisal of the Longwu Emperor

陈支平

Chen Zhipi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 14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隆武帝及其再评价问题

A Reappraisal of the Longwu Emperor

陈支平

Chen Zhiping

内容提要：

现代史家对于南明时期福建的隆武帝评价颇为正面，认为其个人生活品德甚为俭朴自律，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然而我们参酌当时的多种记述，发现这种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景。隆武帝的锐意北伐完全不切实际，其对后宫的管理，破坏了明代后妃不得干预政治的禁忌。清初遗留存世的文献，几乎都是文人们撰写的，他们一方面同情隆武的遭遇，一方面谴责海盗武夫出身的郑芝龙兄弟的跋扈独行，因此往往把较为美好的文字加诸隆武帝身上，而把一些不实恶谥加诸郑氏兄弟身上。这样的偏执笔法，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南明历史记述的不实，造成了后世的不少误解。

关键词：

隆武帝 北伐亲征 后宫

ABSTRACT:

Many of modern historians consider the Longwu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Ming regime a frugal, virtuous, and self-disciplined ruler who could have brought resurgence to the dynasty. Nevertheless, a wide range of contemporary records reveal otherwise. His determination to embark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s unrealistic, while his handling of his wife and concubines broke the Ming-dynasty rules that strictly prohibited the wife and concubines from interfering with political affairs. Extant early-Qing literature was mostly written by scholars who, on one h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misfortunes of the Longwu Emperor, and, on the other hand, detested the arrogance and vulgarity of Zheng Zhi-long (a.k.a. Nicholas Iquan Gaspard, 1604-1661) and his brother, who used to be pirates and warlords. Scholarly discontent with the latter often resulted in false glorification of the former. The biased appraisals, to a larger extent, contributed to some of the inaccuracies in the Southern Ming historical records, causing considerable misunderstandings from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Longwu Emperor, northern expedition led by the emperor, empress and imperial consorts

一 关于隆武帝研究的文献辨析

明朝在北京的政权灭亡之后,一些王室成员在南方地区建立了若干个小政权,史称“南明”朝廷。在福建,由原唐王朱聿键建立的小朝廷,建元“隆武”,故称“隆武”政权。自清初以迄当今,人们对于隆武皇帝朱聿键的评价颇为正面,认为他不失为一位励精图治、有志恢复大明朝的帝君,只不过由于受到某些臣下特别是郑芝龙家族的掣肘,不得尽展其志,终于功败垂成、云消烟灭。在此,举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顾诚先生所著《南明史》的评述为例。顾先生评述朱聿键的抗清北伐亲征政策时写道:“朱聿键能够洞察客观条件的变化,总结弘光覆灭、潞王降清的教训,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的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的阻扰,没有实现。朱聿键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仍然值得称道。”在内政方面,顾先生写道:“隆武帝在南明诸统治者中是比较关心百姓的。为了减轻民间疾苦,他施政的一个重点是整顿吏治,严惩贪污。”在个人生活品德方面,顾先生认为:“朱聿键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罕见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描述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顾先生总结说:“以上谈到四点都说明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¹

现代学者们研究南明历史以及隆武政权的历史,主要依靠当时一些当事人的文献记载。这其中的许多文献,在清代曾经长期被视为“禁书”,传世很少。一直到了清末,随着反满运动兴起,这些记述明末清初时期反清、抗清的珍稀文献,被纷纷挖掘了出来,从而掀起了20世纪研究南明历史的热潮。

20世纪以来学者们研究南明历史,往往认为这些当时当事人的记载,出自亲历,可信度高,就不免不知不觉地过分依赖了这些文献记载。本人在《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读》一文中,也曾经提到:“学术的客观性是历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时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然而对于南明历史的研究,却始终掺杂着过多的主观意识与史实的推测。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百多年来史家研究这段历史所能依据的史料记载,基本上是来自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当时朝廷易代并且参与了抗清活动的人们的痛苦记忆。这种痛苦记忆的历史叙述,必然贯穿着两种挥之不去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明代后期的政治惯性。明代后期,朝廷政治的最大弊端,莫过于朋党对立、纷争不已。而当清军入关、大敌当前之际,南明的小朝廷们试图抵抗清军的入侵进而光复河山,当务之急无疑是应该团结一切所能团结的力量,一致对敌。然而实际的情景并非如此,南明的小朝廷以及绝大多数的追随者们,基本上沿袭了明代后期的这一政治积痼,各立山头,相互攻讦指责,四分五裂。在这种政治惯性的影响下,当事人所能留下来的记载,就不能不充斥着大量诸如‘汉贼不两立’的文字表述。主观意识之二,是存在着过多的事后设想。由于有着‘汉贼不两立’的前提思维,许多当事人在描述史实过程的时候,往往会把事件的失败,归咎于其他朋党以及其他的不同政见者,同时又往往会设想出一套自以为高明的政策、策略及战术来。可惜的是当权者不能采纳自己的这些对策,否则局面断不至于如此的不可收拾。政治立场的偏见与事后诸葛亮式的设想,当然都不是记述

1 以上见顾诚:《南明史》,第205~20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历史学文献的合理方式。当然，明末清初之时这些当事人撰写这些记忆文字，大多是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恨与悲痛，并不是为了给后世的历史学提供什么翔实资料的。然而不幸的是，清朝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史官们，似乎不太愿意或在意给后世留下过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详细文献记载。于是，这些失败的当事人所留下的关于抒发自己情感的痛苦记忆的文字，却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后世研究南明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记载了。这样，南明史料中过多的主观意识与史实的推测，就不知不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后世的研究者们所承继了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研究南明这段历史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南明时期的某些政治与道德的价值判断，以及莫名其妙地为三百多年前的一些事件作出自己的历史设想。”¹

二 隆武帝的北伐亲征之举罔顾现实、不切实际

这种文献记述模式与史实评判标准，反映在福建的隆武政权之上，则是塑造了以唐王即隆武皇帝朱聿键及黄道周等一班文臣锐意中兴恢复和以郑芝龙集团等一班以盗寇出身、拥兵自重挟制朝廷谋私利的两种势力的对立，最终丧失了中兴恢复的大好时机，惨败于不可收拾。撇开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隆武皇帝与郑氏集团在抗清战略上的最大分歧，在于是否开展北伐。隆武皇帝朱聿键及黄道周等一班文臣锐意中兴恢复，极力主张北伐，而郑氏则主张扼守福建北部险关、占有全闽之后再图后举。究竟是大举北伐、收复中原，还是扼守险关、占有全闽，这是一种战略决策。而战略决策的可行性，是建立在对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因素的正确评估之上而作出的，缺乏现实依据的凭空设想，只能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败。

综合清代前期各种文献关于隆武政权的军事实力与所处环境的种种记载，我们不得不认清这样的事实：隆武皇帝以及黄道周们的这种北伐中兴的战略设想，是缺乏现实基础依据的，相反的，郑氏所主张的扼守险关、占有全闽的战略构想，是在当时形势下最为合理可行的决策方案。隆武政权覆灭后，郑成功集团在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与清军对峙抗争达四十年之久，正说明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隆武皇帝：他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皇室后裔，但不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战略家或“中兴之主”。

隆武政权如果真要施行北伐，至少应该具备“兵精”与“粮足”两大前提。隆武政权何来兵精和粮足这两大前提呢？先说兵精。隆武时期所拥有的明朝体制的军队，基本上是从江浙、江右一带战败溃退下来的军队，这其中包括郑鸿逵所部的军队。这些残余的明朝体制的军队，一是行伍不全，游兵散勇居多。二是队伍涣散，缺乏坚实的战斗能力。郑氏集团所拥有的队伍，数量不详。但是这些队伍一贯是以海上武装为主，并不擅长陆战。即使是到了郑成功时期重建军队之后，郑成功的军队也基本上保持着善于海战而不长于陆战的传统。再者，郑芝龙在其晚期已经归降于明朝，担任了明朝的官职，即使保留一部分海上武装，其数量也有限。再说粮足。福建省素来是人多地少的区域，粮食的自给时有困难，政府的税粮征收，不是明朝财政的重点。明代历朝政府也没有在福建设置粮食及税银的储备制度，从政府的体制上看，福建并不存在粮足的条件。当然，郑芝龙集团经过多年的海上贸易活动，应该有相当的财富积累。但是从制度的层面上说，这些财富毕竟属于

1 陈支平：《史学碎想录》，第96～9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私家财产，只可“义劝”，不能强求。至少郑芝龙本人并没有“毁家纾难”的意愿和决心，这部分财富还是不能计算到隆武政权的“粮足”上去。因此，从当时隆武政权的实际境地来考察，既无精兵，也不粮足，完全缺乏与清朝军队作正面硬碰硬地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隆武政权既然不具备与清军正面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精兵粮足”的能力，可是在隆武政权内部，徒托空言、不顾实际而怂恿朱聿键亲征的官员比比皆是。于是朱聿键信以为真，他在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秋七月乙卯日的亲征诏书中写道：

朕仰赖天地人之盛眷，故今大出二十万之雄兵。先钦差御营御左先锋定虏侯郑鸿逵统领大兵十万，内令前军都督府总兵官施天福道出广信；后军都督府总兵官黄光辉一军道出金、衢，该爵亲领右军都督府总兵官陈顺等及中军文武监纪推官等副参游等八十员，驰赴军前，适中调度。再钦差御营御右先锋永胜伯郑彩大兵五万，内令前军都督府总兵官陈秀、周之藩一军出汀州，直抵南昌；王秀奇、林习山一军出杉关，直抵建昌，该爵亲领都督副总兵洪旭督运及中军文武监纪推官等副参游等八十员，驰赴军前，适中调度。再差都督府总兵官郑联、林察领兵一万，舡三百号，由福宁直抵温、台。此水陆二支，俱听定虏侯节制。以上勋臣兵将，自七月二十八日，朕亲登台福祭授钺专征之后，务令星驰电发，齐至南京，速救涂炭。择定八月十八日，御营御中军平虏侯郑芝龙，总兵郑泰，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黄道周及文武五府六部大小诸臣共一百四十六员，尽起福州三卫戎政五营共兵二十万，正天讨之亲征，为四路之后劲。再差都督府郑芝豹领兵一万，护送御用钱粮。再差户部侍郎王观光、兵部侍郎吴震交督诸军之月饷，明各路之军经。再差礼科给事中陈履贞监军于定虏侯，兵科给事中严通监军于永胜伯，凡有军机，俱同商榷。两侍郎即准于随征文武内量才速补，令即视事，一面飞疏奏闻。¹

这种亲征诏书，显然毫无现实依据，但是在当时隆武朝野之内，除了郑氏集团主要人物之外，几无怀疑者。而当郑芝龙提出要征集二十万大军固守福建北部各险关并且着手筹集军饷时，反而遭受上下攻击。关于这一点，连《明季南略》的作者计六奇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在“郑芝龙议战守”中说：“集廷臣议战守，兵定二十万，自仙霞关以外，宜守者一百七十处，每处守兵多寡不等，约计十万。余十万，今冬精练，明春出关。一枝出浙东，一枝出江西。统二十万之兵，合闽、两浙、两粤之饷计之，尚虞不足。”²

从隆武政权的当时形势来分析，人们所痛恨声讨的郑氏集团拥兵自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从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来分析，郑氏集团究竟有多少军队可以自重？恐怕就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在内。郑氏集团的优势在于海上，善战于陆地的军队本来就没有，小朝廷严令郑氏出兵江西，本来就是一项没有现实基础的措施。我这里举一个在当时比较没有政治集团纠葛的福建籍官员王忠孝的记载，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郑氏集团奉命扼守福建北部关隘的无可奈何。《惠安王忠孝公全集》中有“王忠孝自状”一则，记述王忠孝于1645年奉隆武帝旨北上巡视仙霞、二渡诸关军备事，该“自状”描写他在这里的所见云：

1 引自钱海岳：《南明史》卷二《本纪第二·绍宗》，第73～74页，中华书局，2006年。

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

行至浦城，上仙霞，及江右永丰二渡关，逐一宣谕安戢。所至邑居，烟火如故。惟村落居民，挈家入山谷，留丁壮看家，盖怵虏，亦避兵也。而是时行在称关兵淫掠状，汹汹骇听闻。余旋朝，据实以闻，谓有迁徙，而无掠害；但兵甲钝弱，未可言战，因并及战守布置。上颇以为然，而终疑兵无掠害一语，则先入之言也。¹

从这则《自状》中的记载看，王忠孝亲历闽浙赣边关，所见到的情景与在福州行在的传闻完全不同：一是兵甲钝弱，未可言战；二是兵无掠害，烟火如故。但是当时朝中的文官们，为了委罪于郑氏，盛传这其拥兵自重，军纪恶劣，贻害百姓。二者反差是何等严重。尽管王忠孝与郑氏并无过多交情，于文官们反而交往密切，但是据实以闻，还是不能得到隆武帝的认同，“终疑兵无掠害一语，则先入之言也”。所谓隆武帝之英武勤勉、中兴有望，亦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当时危急的关头，郑鸿逵和郑成功叔侄，均身在前线，并无“避寇自重”的行为。相反的是，他们屡屡在隆武帝等不切实际的旨意督促下，显得十分的无奈。《全集》复记云：

上（隆武帝）锐意出赣，公（王忠孝）力谏不可，郑鸿逵亦切谏。上曰：“与廷臣议之。”时大士蒋公、骆公、何公，少司农汤公，暨行在诸公俱集。鸿逵指画关门险要，置烽增垒，星罗棋布，为十可守、百不可出之议。公与蒋公云：“所不与共心力者，有如此水。”乃共规派兵卫参置文武。鸿逵与其侄赐姓成功，分域严备，诸公则督饷督师。凡数日，颇有条绪，合奏。上意坚不可挽。鸿逵曰：“吾赴东海死耳！”遂削发缴印敕去。关门守御俱弛，而有输款清朝者矣。公归，斥卖田园，以为行资。上曰：“速之，迟则不能待矣。”及公至，上已出莅剑州。北岸皆毳帐，独成功一军未动。公望北哭，成功执公手曰：“先生何之？吾叔侄在，卷土重来，未可知也，且归再计。”公从间道入山。清法严，所至人无敢藏匿，姑削发入空门，因得与同志商举事，遂鸠集师徒。丁亥夏，与鸿逵、成功，及光禄卿诸葛倬、都宪沈佺期、职方郎张正声、礼科郭符甲、翰林林垓、御史林兰友，同时举事，收复郡邑，义声大振。²

从《惠安王忠孝公全集》中的这些记载看，所谓闽浙赣边界的杉关、仙霞关之险，根本就无兵可守，郑氏兄弟虽然主张积极防守，但是一方面力量有限，另一方面又得不到隆武朝中的倚重，备受指斥，显得十分无奈，不得不含恨撤退。至于说郑氏集团的海上力量，虽然曾经打败过荷兰人，但是这次战斗毕竟是小规模的。郑芝龙纵然有一些海上武装力量，也基本上属于海盗类型的，并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海军。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后来郑成功军队的组成上就可以看出来。郑成功的军队没有从乃父那边收编下来多少的陆上军队和水师军队。郑成功军队的组成，大多是通过其他途径而形成的。

即使隆武年间郑芝龙兄弟拥有一部分海上武装力量，远离福建根据地而远征北伐，也是十分不明智的。

1 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第34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

2 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第259～260页。

顺治后期郑成功经过多年的准备，远征南京，很快失败。郑成功在南京的失败，几乎成了郑成功力量从顶峰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其原因很明显：郑氏集团擅长在福建沿海地带进行海战，而不擅长陆战。郑成功的南京之役，可谓是“扬短避长”之战。而隆武帝朱聿键不顾当时政治与军事的实际情况，一味地相信那班徒托空言的臣子的怂恿，执意北伐，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早已注定了。

王忠孝虽为福建惠安人，但是他以进士出身，素与郑氏集团没有关联。在当时文臣群攻郑氏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巡关之行，王忠孝很可能加入文臣攻郑的行列。因此，王忠孝的记载，应该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当时请命到福建北部险关巡边的还有内阁大学士蒋德璟，亲临其境之后，也发现情况根本不是朝中所渲染的那样雄兵处处、亲政必胜，《明季南略》记云：“阁臣蒋德璟见郑师逗留，因自请行关，确察情形，相机督战。隆武许之。比至，则疲兵弱卒、朽甲钝戈，一无可为，德璟因叹息告病去。户部尚书李长倩以饷不继，忧愤而死。”¹ 可惜这些真相，隆武帝不屑一顾，更不愿意切实地去了解。

实际上，当时怂恿隆武帝北伐亲征的臣下甚多，由于各自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这些北征的建议，大多毫无实际可行之处、各怀鬼胎。如李天根在《燭火录》中所记：“大学士杨廷麟请王出江右，何腾蛟请出湖南，浙中诸将请幸衢州。原任临清州知州金堡陛见，言腾蛟可恃，芝龙不可恃，急宜弃闽幸楚。王大喜，即授堡兵科给事中。”² 隆武帝毫无定见，对于臣下的高调空言深信不疑，以为只要自己御驾亲征，天下即刻可复。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作风，当时有些头脑比较清晰的臣子还是有所认识的。如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的路振飞，就曾经婉转对隆武帝指出其空有高调而无实效的弊端。《燭火录》记云：

唐王每切责廷臣怠玩，路振飞因进言：“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命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笃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者，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³

路振飞作为隆武政权中的最主要官僚之一，对隆武帝提出如此激烈的批评，可以想象一部分臣下对于隆武帝严重缺点的失望。

在当时兵弱饷困的处境下，郑氏集团的成员们主张坚守闽北险关的策略，可能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但是南下溃退至福建的这班皇室成员及文臣们，最擅长的是高调北征，不顾实际。而主张坚守的郑氏集团，却成了众矢之的。就郑芝龙等一部分郑氏集团的成员而言，确实在当时的情势下有着某种保护自身利益、首鼠两端的心理和行为，但是还有另一部分郑氏集团的成员如郑鸿逵、郑成功等，都是极力主张抗击清军的重要人物。王忠孝的这些记载，或许对于我们比较客观地了解隆武时期的战守情景，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蒋德璟告病》。

2 李天根：《燭火录》卷一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3 李天根：《燭火录》卷一三。

三 隆武后宫及曾后干政

关于隆武帝的个人生活品德问题，我在开篇中引述了顾诚先生的正面评价，近人钱海岳先生的评价亦有同样的观点，兹引述钱海岳先生在《南明史》中的文字：

上长身丰硕，声如洪钟。即位后长斋布素，不御酒肉，日在便殿见大臣，讲求政治，票旨皆出手裁。后宫无嫔侍，仅执事三十人。平国公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近。性好读书，披览丙夜不休，所撰三诏、祖训后序、行在、戎政、搢绅、儒林便览序，典雅可诵，群臣莫能及云。

钱海岳接着对于隆武帝作了整体的评价，其评价之高，似又超出所有的文献所述：

赞曰：绍宗英密精明，连茹众正，有雄武之志，霸王之畧焉。自继大统，宵旰忧勤，听纳谏说，章奏朝至夕发，礼乐刑政自出，又循良爱民出于肺腑，每戒出兵毋伤难民以促国脉，仁政沛发，沦人肌髓。及六师亲征，枕戈泣血，誓清孝陵，葬烈庙，迎圣安。大江南北骄将巨憝，相率归命。庶几封狼之业，三犁之烈，巍乎焕乎，夔哉无前者矣。顾大臣推诿养望，郑氏包藏祸心，仙霞卖关，金根不返，非所谓多亡国之臣者耶？虽然，葛生有言：“事之不济则已尔，安能复为之下？”上以国君死社稷，追配威宗，谥号曰襄，允矣夫！¹

钱海岳认为隆武帝“后宫无嫔侍”，在当时战乱非常时期，估计隆武帝的后宫不至于有太多的妃嫔，这应该没有问题。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看，记述较多的是隆武帝的皇后曾氏。钱海岳的《南明史》中对曾皇后有专门的传记，兹抄录如下：

绍宗孝毅曾皇后，南昌人。崇祯五年，绍宗袭封唐王，后年十九，册为王妃。颇知书礼，任内政，上甚重之。九年秋，京师戒严，上以擅发护军勤王得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遇益艰苦，以土作枕，草荐为褥，无怨言。早晚劝上毋忧，自有昭雪之日。上病频殆，后恐医药有诈，不与饮，入夜默祷于天，剝股进之。事闻，威宗旌其贤孝。后又上疏为上颂冤，谓：“郑藩谋为不轨，尚蒙宽宥，复爵加禄。氏夫为父复仇，预奏于五年之前；出城未离于封域之内。孰轻孰重，较论易明。革发四年，身经九殒，议贵议亲，会典具载。”以是上德后而且憚之。弘光时，以赦徙平乐，抵浙而南京亡，后劝上为嗣统计。及即位，于隆武元年八月十三日册为皇后；封后父文彦吉水伯，母何氏伯夫人。上性俭，官中屏金玉锦绣，器用瓷锡，帟幕衾裯率大布为之。懿旨选女嫔十人，上以为扰民，不许。……是年十二月，上亲征，繇水道进，后从幸。密言郑芝龙不可恃，请就何腾蛟。芝龙阻之，不果，移驻延平。二年六月，后生皇子琳源。八月，清兵度仙霞岭。二十四日，上自顺昌出狩，命

¹ 钱海岳：《南明史》卷二《本纪第二·绍宗》，第118页。

后先发，舆出河干，顾从臣曰：“刘宫人有任，好护持就道。”词旨慷慨。清兵迫，妃媵狂奔，有一舸数人、一骑三人者。二十七日，如汀州。翌日昧爽，周之藩朝行在，闻上与后角口声。俄十余骑突入行宫，遂并蒙尘。行至九龙潭，后赴水崩。司礼监王至道、尚衣监邓金等拒敌，从死者十余人。或曰，后与上崩于汀州府堂。又曰，上至邵武，知事不可为，有二宫人缢死，取三棺钉之，其一则后也。昭宗立，遥上尊号曰思文皇后；已追谥曰孝毅贞烈慈肃贤明承天昌圣襄皇后。¹

钱海岳先生的这篇《绍宗孝毅曾皇后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曾皇后的生平事迹，但因此也从中透露出他所谓的隆武帝“后宫无嫔侍”之不确。如在上引文中，皇后一行即将为清军所迫及，曾皇后作为后宫之首，在危难时刻，还能顾及隆武帝血脉，掩护已经怀有身孕的刘宫人先行，“顾从臣曰：‘刘宫人有任（妊），好护持就道。’词旨慷慨。”在《绍宗孝毅曾皇后传》之末，附有“宫嫔某”的事迹云：“宫嫔某，于汀州之变，以身翼上，奋力掣救，受乱刃死，暴尸旬日如生。”²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引华廷献的《闽纪》亦记云：“隆武自芝龙去后，闻清兵信急，遂决计幸赣。八月二十一日甲午启行。……上好书，虽崎岖军旅，犹载书十车以从，以至钗鬟谄谀锦之辞，裾佩嫔玉台之咏，岂料有播迁事乎？二十四丁酉，上抵顺昌，……行宫数骑突出，云驾已在内。……曾后肩舆河干，顾从官曰：‘刘宫人有怀，好护持就道。’辞旨慷慨，使遭时隆盛，虽鸡鸣黄鸟，曷以加兹？”据此，则隆武帝的后宫，除了曾皇后之外，至少还有“刘宫人”和“宫嫔某”³。

根据华廷献《闽纪》的记载，当时跟随隆武帝与曾皇后一道奔赣的后宫宫人似为数不少。当隆武帝与曾皇后为清军所迫及，随行后宫大乱，其中除了朱聿键的生母及母辈的“光华陈太妃”和“沈太嫔”外⁴，其余的“妃媵狂奔，有一舸而数人者，有一骑而三人者。时廷献犹寻盟丘壑，猝不及谋。其出东门，有女若林，咸争小艇，如慈筏登彼岸。关兵溃回，戈戟满路，夹道而驰，崇岗蹭蹬，再蹶再起。日夕路修，牵衣结队，极人生未有之苦。”⁵

钱海岳在《绍宗孝毅曾皇后传》中对于曾皇后的生平颇为赞扬，但是从其他的文献记载中，曾皇后不仅喜欢干预朝政，而且生活也并不节俭，在当时经费军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有所挥霍。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有如下的记载：

郑芝龙所招关门兵，不过疲瘵数百人而已。廷臣请出关者，章满公车。隆武每欲躬履行间，而芝龙但以缺饷为辞。会十月曾后至，迎入官。时胤嗣未育，或劝珍摄以俟来春，乃暂止。初隆武孤身南来，鸿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献，随居官衙。至是，曾后至，遂大兴工作，扩构宫殿。扈匭之属，皆用黄金。开织造府，造龙袍，后下体服皆织龙凤。然后性傲敏，颇知书，有贤能声。隆武每召对

1 钱海岳：《南明史》卷二五《列传第一·后妃》，第1396～1397页。关于曾皇后死于何处，清初文献记载中有多种说法。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贝勒杀隆武帝后》云：“清兵过延平而东，独陈谦之子帅数骑追驾，为其父报仇。及之赣州，时隆武将入赣，因停一日晒龙凤衣。陈谦子适追至，遂及于难，并执曾后及从驾官朱继祚、黄鸣俊，械至赣州。贝勒杀隆武及曾后于市。朱继祚勒令致仕，旋为乱兵所杀。鸣俊许授五品官，以老疾辞免。”

2 钱海岳：《南明史》卷二五《列传第一·后妃》，第1397页。

3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隆武奔赣》。

4 见钱海岳：《南明史》卷二六《列传第二》，第1406页。

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隆武奔赣》。

奏事，后辄于屏后听之，共决进止，隆武颇严惮之。¹

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曾皇后生产，皇子朱琳源诞生，隆武帝与曾皇后竟然不顾当时的困境，大肆庆祝，计六奇复记云：

六月，皇子诞生，群臣贺表，有“日月为明，止戈为武”语，隆武嗟异。大赦，覃恩，郑氏厮养俱得三代诰。撰敕者、织轴者日不暇给。当是之时，兵赢饷绝，行止犹豫，召对会议，欠伸而已。当事无谈及兵事者，举朝如梦如醉，不待识者而知其败坏矣。²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就立下严格的诰诫，后宫及后戚不得干政。隆武帝以饱读诗书自豪，连逃难时还要携带大量书籍，他断不可能不知道其祖先的这些诰诫，但是他并无顾忌，不仅随意让曾皇后干预政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进诏书之中。他在那片徒托空言的亲征诏书中告示臣下：

其行在京师，则暂以皇后垂帘听政，益王世子领班。传命则以司礼掌印太监庞天寿，佐理则以内阁辅臣何吾与、林欲楫，总理留务造器转饷，则以吏部尚书张肯堂、侍郎王志道，严守城池则以戎政总兵曾德、总兵郑之英。留兵二万。文武百官务都疆之两顾，兼战守之齐行。³

这种严重违反祖制的皇后干政，自明太祖以来，北京历朝均未曾发生过。正因为如此，在诏书中被委以“总理留务造器转饷，则以吏部尚书张肯堂”，就大不以为然，他向隆武帝提出不同意见，反遭冷落，所谓“后既素能理事，凡批阅章奏，多所参驳。每临朝，则垂帘座后，以共听断。张肯堂疏言垂帘非圣世所宜，后大恚，肯堂以是见疏”⁴。可见隆武帝至少在后宫问题上，并不“洞达古今”、“听纳谏说”。

四 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以往学者所认为的隆武帝个人生活品德甚为俭朴自律的评述，多少受到清初文献记载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清初遗留存世的文献，几乎都是文人们撰写的，他们一方面同情隆武的遭遇，一方面谴责海盗武夫出身的郑芝龙的跋扈独行，因此往往把较为美好的文字加诸隆武帝身上，而把一些不实恶谥加诸郑氏身上。这样的偏执笔法，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南明历史记述的不实，造成了后世的不少误解。我们通过南明隆武政权及其后宫史事的某些分析，或许对于进一步厘清南明的历史真相，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曾后入闽》。

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皇子诞生》。

3 钱海岳：《南明史》卷二《本纪第二·绍宗》，第74页。

4 钱海岳：《南明史》卷二五《列传第一·后妃·绍宗孝毅曾皇后》，第1397页。

